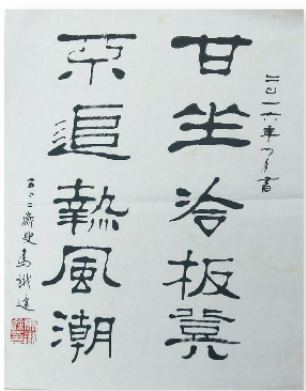


从马识途的一篇佚文谈起



慕津锋



2024年“五一”假期,为了进一步充实《马识途年谱》的内容,我连续两天去了国家图书馆报刊阅览室,查阅那里收藏的1983年至1995年的《成都晚报》。20世纪80年代后期,马老在《成都晚报》曾发表过一系列杂文和散文。很多文章都收录在《马识途文集》中,但文集并没有标注这些文章发表的时间和刊登的报刊名称。在我编写的《马识途年谱》中,这些文章并没有录入,因为没看到发表时间和出处。当我得知国家图书馆收藏有《成都晚报》后,赶紧趁着这个难得的假期预约前往查询。按照国图规定,访客每次只能看三份该报合订本,看完后再预约另三份。当我第一次按照流程完成预约后,工作人员让我在旁边耐心等待40分钟,他们去通知工作人员从库房提取再送过来。

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那厚厚的合订本,我的心情有些激动,一层薄薄的灰覆盖在合订本的硬壳封面上,应该是很久没人翻动过它们了。我小心翼翼地翻开,报纸纸张较脆,且已发黄。我认真地一页一页翻阅……两天查阅下来,收获还真不少,我查到好几篇马老的文章。

5月2日下午,就在自己疲惫不堪想要快点结束时,我发现了一篇很珍贵的佚文。那天下午,或许是阅览室太过温暖的缘故,我有些昏昏欲睡了。翻到1987年9月13日《成都晚报》第三版,一个大标题和醒目的作者名字——马识途,进入我的视线。这一发现让我瞬间

清醒过来。我揉了揉眼睛,确实是一篇大半版马老的文章,文章标题为《他与成都同在——悼念米建书同志》。这个标题,我很陌生,在马老的文集中我好像没看到过这篇文章。我迅速拿出手机中保存的《马识途文集》目录,细细查下来,确实没有发现这篇文章。由此可见,这应是一篇当年没有收录在《马识途文集》中的佚文。

马老在《他与成都同在——悼念米建书同志》一文中深情回忆了他与老战友米建书的交往情谊。他们是在成都解放时认识的,从1949年年底算起到1987年,走过了38个春秋。在马老眼中,米建书是一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老黄牛”,同时还是一个有思想、有能力、会干事的“好干部”。

我在马老的文章中曾见到过米建书这个名字,应该是在他谈及《清江壮歌》时。1960年,马老刚刚创作完成《清江壮歌》,身为成都市市长的米建书在得知老友写了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革命小说后,第一时间找来,不由分说地要把小说拿到《成都日报》发表。《清江壮歌》是马识途以自己的战友烈士何功伟、刘惠馨为原型创作而成。何功伟、刘惠馨两位烈士是上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怀着推翻旧中国、建立新社会的理想来到清江河畔的鄂西恩施地区,开展地下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最终遭到敌人杀害。《清江壮歌》所描写的事件发生在抗日战争年代,这些故事既是小说,也是历史真实。

也正是看到小说的内核价值,米建书

才希望在成都首发这篇小说。其理由是要让成都人民知道新中国是多么来之不易,是多少先烈用自己的青春和鲜血才换来我们和平、安宁、幸福的生活;更要教育成都的年轻人不要忘记先烈为新中国的诞生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听到米建书这样说,马识途爽快地同意了他的建议。《清江壮歌》从1960年5月21日至12月14日,在《成都日报》共连载160期,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市民每天都要去买一份《成都日报》,追看《清江壮歌》。

5月2日晚上,我联系了马老的外孙媳妇,我们一起在编纂马老文章的补佚卷。当看到我发过去的图片后,她确认自己没见过这篇文章,《马识途文集》应该没有收录过它。我们猜测很可能是当时编辑人员没有看到这期报纸,这个“大部头”就这样被遗漏了。还好,这次发现了。我当晚便把这篇文章全文整理出来,经过两次审校后,把它录入我编辑的《马识途佚稿》一书。

因为有了这个“重大”发现,我很开心,虽然很疲惫。曾经有朋友问我,你在这

我很认真地告诉他,我的“快乐”是:如果我能从旧纸堆中找到一丝线索,进而有了发现,尤其是有了“重大”发现,而这个某个恰又能填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某个空白,我内心的那份激动与精神上的满足就是我所追求的快乐。其实每一篇追忆文章背后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有些故事可能被历史熟知,有些则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被遮蔽、湮没或忽略。也正因此如此,史料发现与研究就变得十分重要,也十分迫切。因为它可以使这些沉默的文章“活起来”并“开口说话”,为我们讲述属于它的传奇。

我与马老相识25年,早已是情谊深厚的忘年之交。马老曾跟我说过:做任何事,尤其是在做研究方面,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他曾写过这样的诗句表达他的意思:甘坐冷板凳,不追热风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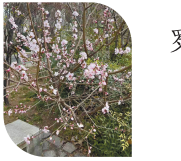
马老说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中。做了多年史料研究,我的感受是:很多时候,史料研究确实很“孤独”。我常常一个人在浩瀚的“故纸堆”中一点一滴地寻找作家们留在黄纸浆上的足迹。当翻看有厚厚的一堆“故纸”,一无所获时,冷清、寂寞还有失落,便会涌上心头,但这只是我那一刹那的情绪。史料研究需要从从业者“脚踏实地”,要“吃得苦”,要“经得起折磨,耐得住寂寞”。也正是这样不断坚守,我才写出了一些还算有些意义的文章。在这条路上,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能用“笨办法”。

马老这篇佚文的发现也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我很希望自己能翻阅尽可能多的资料,为马老做一份内容充实、资料翔实的年谱,为马老的文学研究作出自己一份小小的贡献。我想找到更多珍贵的文章,让它们“开口说话”,为历史讲述更多故事。我觉得这也是我肩负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份责任的意义,往小了说,是让它们为读者讲述马老110年精彩、传奇的一生;往大了说,是为传承中国百年文学史的文化,让喜爱文学的人通过它们承载的历史信息,记得住历史沧桑,看得见岁月流痕,留得住文化根脉。记住马老那一代人为我们这个民族、为这个国家、为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作出过怎样的付出与牺牲。

一个记住历史、铭记英雄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

生活处处是风景

罗江燕



将水滴吸收,水印由深变浅。水珠不断坠落,在墙面画出新的印记,深深浅浅地染成一片,与刷墙时留下的一条条弧线,和墙面深浅不一的灰色彩块形成一种奇妙的组合。水印点在深灰的色块里,变成了一片片烟雾笼罩的“草坪”和“山坡”。整面墙像一个小岛棋布的湖。雨越下越大,一条条水柱从墙顶倾泻而下,像参差倒挂的钟乳石柱。“平湖”变成神秘的“溶洞”。我坐在门前,欣赏着院墙上的一幅幅流动变幻着的画卷,收获着独属于自己的静谧与惊喜。

对于美好的景物,我总格外地多几分期待与珍爱。无论是巍峨耸立、云雾缭绕的高山,还是波光粼粼、水天一色的湖泊,抑或村野深巷里的一草一木,都能精准地击中我内心最柔软角落。脚步不自觉地停下来,满心赞叹。欣赏美景,能让让人内心宁静、愉悦。乡间屋顶生起的袅袅炊烟,是人间最温暖的诗行;苍穹下一望无际的稻田,是诗意四季的画卷。老伯坐着横在田埂上的铁锹柄,抽着自卷的烟,望着风中摇曳的禾苗,露出欣慰的笑容;小女孩站在路边,对着水沟旁钓鱼的哥哥甩去一串肥皂泡,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收工的人们一边相互打着招呼,询问农事进展,一边收拾农具,卸下一身疲惫踏着暮色归去。这些平凡又鲜活的瞬间,等待我们放慢脚步,用心灵的镜头将它们一定格。生活即是人间一道最美的风景。

《亲爱的梭梭》是青年作家霍晴的首部长篇儿童小说,小说以多年后成为植物学者的“我”的回望起笔,讲述了11岁男孩跟随六步洼村里的父辈们一起前往阿拉善草原寻宝的远行经历。经由时间叠印的视线,这场良善与欲望交织的自我成长之旅关于爱的试炼,关于内心深处秘密的坦白,事关守护家园的诸多生命奥义,这趟旅途也在拂面而来的沿途风光里隐含着——一位少年成长蜕变的心史。

透过少年打量日常生活诸物的真挚眼光,故事的讲述为心灵深处的成长历程敞开了多重探照路径。虽然生

在心灵世界种下一棵新苗

——读霍晴《亲爱的梭梭》

易彦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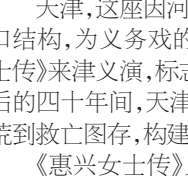


贫瘠并未湮没“我”对于美好风物的感受力。相反,小说细致地捕捉到日常生活中的诸多动人情境,就像是那碗拌入肉末的混着一小片油花的米粥,那颗叫作“土生”的小树新长出的叶子,那根因风沙沉积不断“长高”的电线杆,还有公路沿途所看到的新鲜而阔大的世界……这些富有神采的细节是乡愁记忆里的琥珀,它们映射出少年眼中充满新鲜感的生活风景,随即成了向往热腾腾的现实生活不断延展的枝丫,重新激活了读者对发生在日常生活周边的生活情境的感受力。

在《亲爱的梭梭》这部长篇小说里,远行意义的不断变化和流转构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潜在驱动力。最初,在六步洼村孩子们漫无边际的想象中,大人们每每满载而归的旅途是一次次神秘而富有魔力的冒险,他们或许

常犹豫不决的青涩少年,如果说此前“我”在面对父子关系的情感挫伤,与男孩“狮子头”的矛盾时往往选择以逃避的方式去侧面化解冲突,那么在这趟奔赴阿拉善草原的成长之旅里,在与朝鲁先生和那日松的朝夕相处中,陌生的生活经验让“我”见识到蒙古族牧民充满信念感地守护梭梭林的良善之心,它们也为“我”的心灵成长路径提供了新的坐标系。置身于现实世界的混沌地带,当这位昔日懵懂的少年开始重新思考故乡亲友的盗采行为,他逐渐在愧疚不安的情绪漩涡里看出这些陈陈相因的行为背后包裹的驳杂的人性欲念。最终,他一面勇敢地营救陷入流沙中的男孩“狮子头”,一面与男孩“狮子头”一起奋力阻止父辈们的盗采行为,少年土生逐渐通过积极的行动成长为一位拥有明晰辨别力的独立个体,他眼中的生活风景随之发生变化:这片辽阔而光秃秃的阿拉

沾上丛话



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义务戏”作为兼具艺术价值与社会功能的特殊演出形式,既是行业自救的实践,更是近代都市慈善文化的重要载体。其雏形可追溯至清代梨园界的“搭桌戏”——一种为救济贫苦同行,在常规演出中加演场次并将收入全数捐助的行业善举,体现了梨园界“以艺养善”的行业伦理。

天津,这座因河海而兴的北方商埠,因其独特的码头文化和五方杂处的人口结构,为义务戏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1906年田际云携新剧《惠兴女士传》来津义演,标志着天津义务戏从行业互助向社会化慈善平台的转型。此后的四十年间,天津义务戏紧扣时代脉搏,从行业互助到文教扶持,从赈灾救荒到救亡图存,构建起艺术与公益深度交融的城市文化范式。

《惠兴女士传》义演的跨城联动,彰显了清末新式慈善理念的公共转向。1906年2月,北京玉成班班主田际云将杭州贞文女学堂创办者惠兴女士殉难事件改编为时装新戏并在北京义演成功,天津天仙茶园老板赵广顺特约其原班人马,于同年8月在天仙茶园义演两日。据《大公报》记载,此次义演采取“戏资加捐”模式,将募得的英大洋50元、小洋544角及铜元4080枚,悉数上缴“国民捐”。这场天津首次有文献记载的义务戏,不仅促成了京津名伶首次同台献艺,还开创了“固定戏价+定向捐输”的筹款机制。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传统“搭桌戏”的行业局限,将慈善的大门向社会公众敞开,使义务戏从梨园内部的行业互助之举,转变为一场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慈善行动,为天津义务戏的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民国时期,天津义务戏逐渐形成“赈灾救荒、扶危救溺、兴学助医”三位一体的慈善格局,并通过“机构主导—艺人响应—社会参与—媒体协同”的运作模式,成为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支柱。

民国时期,各地频发的水灾、旱灾等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灾难,天津各界以义务戏为主要手段,为受灾民众筹集善款。1907年江北大水,广益善会邀请谭鑫培、王瑶卿等在李公祠连演五天六场,艺善会邀请盖叫天等连演数日助赈。一时间,各茶园纷纷响应,共筹集善款三万余元,全部捐给灾区。1917年京畿水患,津邑沿河一带村庄多被淹没。为救助灾民,京剧演员尚和玉、李吉瑞、薛凤池等在升平舞台、李桂春等人在东天仙茶园义演赈灾。戏剧改良社、雅韵国风社、正乐育会、广东会馆等团体也纷纷加入义演行列,种种善举,不一而足,充分展现了天津各界在灾难面前的团结与担当。

扶危救溺,是天津义务戏的又一重要使命。一方面,为救助贫苦同行举办的“搭桌戏”始终延续着梨园界互帮互助的传统。1929年赵子英在新明戏院演“搭桌戏”,邀请著名票友刘叔度等助阵。1935年天津市游艺促进会将演出义务戏所得购买的米面发放给贫苦艺员,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冬赈义务戏成为城市扶贫的重要方式。天津艺曲改良社每年冬天都会组织义务戏,为贫困百姓筹集冬赈物资;八善堂、天津慈善事业联合会等慈善组织也会举办冬赈救济会,邀请京津名伶演出义务戏,如1935年天津慈善事业联合会特邀杨小楼、荀慧生等名伶在北洋大戏院演出义务戏,所得款项用于增设粥厂,被时人誉为“贫民之福音”。

兴学、助医是义务戏的两个重要延伸。1929年京津坤角为宝坻喻氏小学筹款扩建。1930年郝寿臣、高庆奎等人为培才学校义演,收入悉数捐助校舍建设。助医方面,北京慈仁医院、天津农工军警医院等机构都曾通过义务戏解决经费困境,凸显出慈善与民生的深度关联。

九一八事变后,天津义务戏的慈善属性全面升华为政治动员工具,成为凝聚民族力量、鼓舞抗日斗志的精神武器。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尚小云与王又宸率先在北洋大戏院演出义剧《白罗衫》与《盗魂铃》,雪艳琴与吴铁庵在春和戏院上演《廉锦枫》《白蟒台》等剧,章遏云露演粤剧《仕林祭塔》与《园林幽怨》,所得票款悉数捐给上海第十九路军的抗日将士。为声援东北义勇军,天津名票俞珊在春和戏院演出《玉堂春》。为帮助榆关受难同胞,陶默庵、奚啸伯在春和戏院举办赈捐义务戏,合作演出《红鬃烈马》。这些演出,传递着天津戏界的爱国情怀,也激励着无数天津儿女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

从1906年《惠兴女士传》首开社会化义演先河,到抗战烽火中的救亡筹款,天津义务戏始终以“寓乐于善”为内核,构建了艺术与公益深度融合的文化范式。作为“九河下梢”的航运枢纽,天津五方杂处的包容性催生了独特的艺术融合,京剧、评剧、河北梆子在这里交融,打破剧种界限,出现了“一台三腔”“梆簧两下锅”的艺术创新。商业文明与江湖道义在这里碰撞,孕育了“义利共生”的伦理自觉,催生出“以艺载道”的实践智慧,也成功完成了艺人从“优伶”到“义士”的身份转型。行业会馆的制度化运作,使得慈善行动不再局限于个体的义举,而升华为城市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天津梨园义务戏的百年历程,既是戏曲艺术与社会责任相交织的史诗,也是近代中国慈善精神演进的微观镜像。如今,回顾这段历史,那些镌刻在戏单账簿中的慈善记忆,见证了传统行业伦理向现代公共精神的转化,为今天的公益事业提供了有意义的经验。义务戏,从江湖码头走向民族救亡的洪流,用艺术诠释了社会责任,用慈善彰显了文化力量,最终凝结为天津的城市精神丰碑。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撰写的系列文章“津派文学与文化丛谈”至此刊发完毕。从下期开始,陆续刊发侯军先生撰写的系列文章“淘书琐忆”。

——编者

我曾在天津看见一个路牌,上面写着“台儿庄路”,作为台儿庄人,在异地见到家乡的名字,感到格外亲切。台儿庄是地处鲁苏交界处的一座小城,天津这样的大都市缘何用这座小城冠以路名?我想或许与抗战时期的台儿庄大捷有关。于是,我便开始查找相关资料予以佐证。

台儿庄在汉代就有村落,目前发现最早有史籍记载“台家庄”之名的是唐代的《创建淮提阁碑》,那时的台儿庄默默无闻。明万历年间,朝廷为漕运安全,避黄行运,开挖运河,将京杭大运河改道台儿庄。于是,台儿庄迎来了发展机遇,因河而兴,因河而美,台儿庄这个小集镇迅速发展成为水旱码头、货物集散地。更令台儿庄扬名海内外的,还是1938年春天的那场大血战。那一战历时月余,取得了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正面战场上的首次重大胜利。这一战,中国军人的血性表现得酣畅淋漓,中国人达到了空前团结,震惊了国人,震惊了世界,笼罩全国的阴霾一扫而光,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也刮目相看,台儿庄因此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中国军民扬眉吐气,奔走相告,欢庆胜利。诗人臧克家当年写道:“台儿庄,红血洗过的战场。一万条健儿,在这里做了国殇……在这里,我们发挥了震天的威力;在这里,用血写就了伟大的史诗;在这里,事实泄尽了敌人的底;在这里,我们杀退了寇兵……台儿庄一片灰灰,台儿庄的名字和时间争长。东风吹罢,灰灰里萌出了新生的嫩芽。”

说起台儿庄战役,不得不提张自忠将军。1936年,张自忠将军就任天津市长,他秉持“少说话多做事”的原则,对天津市的吏治、工商财政、文化教育、社会福利和社会治安等各项事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他忍辱负重,与敌周旋,竭力支撑平津危局,却被国人误解。这年9月,张自忠化装离开北平,来到天津,与家人辞别后重返抗日前线,率领第59军参加台儿庄战役。在危急关头,他率部先增援蚌埠,阻敌于淮河南岸;再驰援临沂,阻敌于临沂、莒县,粉碎了日军会师台儿庄的企图,为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的国民政府收回了所有在天津的租界,重新命名道路名称。我查到1945年12月22日《大公报》的一篇报道《津市重定路名,一改敌伪旧污租界痕迹》,12月21日下午3时,天津市各局召开各局处长关系方面会议,决定道路命名办法。这则新闻还公布了一些公园和道路的新名称,向广大市民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益世报》1946年1月22日也有一篇报道《津变更路名》。报道说:天津市政府工务局,为一新市视视听,特对变更路名,规定四项原则。并为采纳民意起见,特规定自即日起至2月10日止,凡市民对新路名命名有意见者,可以书面向工务局提出。四项原则是:(一)规定七条干路名。其中第四为张自忠路(沿河马路,自金桥桥至旧英法租界交界),第五为台儿庄路(沿河马路自旧英法租界交界,至小刘庄);(二)城厢、河北、南市、西头、旧特二(奥租界)、三区(旧俄租界)各地路名,均恢复民国二十六年前旧名;(三)旧意租界境内路名,均以含有新意义之名,旧英、法、日租界及旧特一区(旧德租界)界内路名,除用人名者外,余均以省名、都市名称之;(四)上述各旧租界及特一区内境内路名字尾,有“道”“路”之分,系区别经纬之意。所谓“新意义”,诸如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的“三民主义”系列和自由道、博爱道、民主道、光复道之类的路名;还有一些路名是以抗战纪念地冠名的,如多伦路、独山路、襄阳路、芷江路、常德路、台儿庄路等。

台儿庄路原为英租界的河坝道,因沿海河而得名。在英租界时期,河坝道是英租界的核心地带,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众多洋行、银行、商号在此设立,如早期德华银行天津分行就位于河坝道旁。如今,台儿庄路属于天津市河西区与和平区,沿线是天津重要的观光游览路线,可欣赏到海河风光及众多历史建筑。张自忠雕像就位于天津海河西岸的台儿庄路上,整座塑像青铜铸造,基座由花岗岩制成,高约10米,重30余吨。张自忠路位于天津市区海河西岸,跨越红桥、南开、和平三区。它让人们一直记着这位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抗日名将。

天津有一条台儿庄路

郑学富



满庭芳

第五三五七期